

中文实录乃根据讲者演讲的普通话即时传译或原声整理，未经讲者审核。

讨论环节：中国机遇

陈启宗：大家下午好，每一年这节都是整个亚洲金融论坛当中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讨论环节，一方面是主题非常吸引人，另一方面是讨论嘉宾非常受尊重，我向大家保证这论环节会非常精彩。这个环节非常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中国热。今天我们请来的四位嘉宾都是非常有分量的。

对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国家。但是基辛格博士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是一个最可以预估的国家。很多外国朋友都认为很难理解，但是对于一个中国通，像基辛格博士来说，中国是最可预估的国家，因为中国永远是照着他自己最好的利益而做决定的，而这些利益你要愿意明白的话是可以明白的，也就是说相当透明的。我知道外国朋友听到这句话很奇怪，中国怎么透明了？要是你真的明白中国到底想要什么的话，他永远照着自已最大的利益来做他的决定。所以是预估性非常高的。

另外，在最近全世界都比较动荡的时候，在英国有脱欧，在美国选了一个很特别的总统先生，现在在全球无论是政治也好，还是经济也好，中国可能最稳定的大经济体之一，或者我应该把之一这两个字拿掉，可能现在全球最稳定的国家，暂时来说，长久不敢说，也许在最近两年最稳定的国家是中国。非常欢迎外来的朋友，从外面来到香港，非常欢迎你们，香港非常特别，在内地除非你有特别的朋友，要不然的话你听到的话都是政府说的话，但是在香港非常特别，在香港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话，但却又不是无知的话，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跟中国在文化上、语言上、地理上是最接近的。所以大家要是对中国有兴趣的话，最好是到香港来。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投票，所以大家现在进行投票。预测 2018 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多少？赵先生选的是什么？

赵柏基：我刚刚投的是第二个，6.6%-7%，今年的增长已经是 6.9%了，明年的增长我觉得也是比较稳定，比较向好的。我分享一些数据，2017 年前三个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4%，境内投资贡献有 33%，这两个数据都是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消费和境内投资。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未来一年，世界的经济环境是向好的，外部环境是好的，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的消费一直在增长，未来一年也能看到会继续增长，制造业投资也会继续回升。这一大堆的数据都表现出未来一年经济发展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陈启宗：谢谢，方总怎么看？

方风雷：我没有投票，第一我不会用这个玩意，第二我不太喜欢继续做这种没有意义的评估，因为 GDP 这种数字没什么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开始要翻开新的一页，和过去 40 年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要走一个全新的模式，高质量的发展，也不会注重于 GDP 增长多少，也不会专注于某一年增长多少，可

能有一个短中期的指标。但是我想说中国经济肯定是增长的，年度的 GDP 意义不大。

陈启宗：从前大家都看 GDP，特别是内地的官员、地方的官员，因为他们的考核都是照着 GDP 来评估的，现在因为各种原因的需要，GDP 越来越不重要。

沈南鹏：我跟方总的观点一样，数字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当然增长肯定是有。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看的是更加高质量的增长，以及整个经济运营体效率的提升。举个例子，中国电子商务渗透率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从中国整个零售来讲，消费不断的增长，但是电子商务本身，我感觉整个经济当中有很亮眼的地方，它不是直接带来 GDP 的增长？未必，当然有些周边产业增长。真正从销售来看，有一部分从线下搬到线上，整体零售的增长和原来的速度一样。但是我们看到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是令人非常欣喜的现象，这是有质量增长的一部分。

张懿宸：我是投了票，我认为是 6-6.5，但是观点上我和方总、南鹏是一致的。GDP 这个数字对中国来讲，已经有太长时间被扭曲了。凯恩斯说你挖一个坑是 GDP，填这个坑还是 GDP，世界上很少有人这么做，但是中国官员就做了。从这点来讲，我同意他们的观点。

另一方面，2010 年我们国家中央当时定了 2025 年 GDP 翻一番的目标，这个定量的目标存在。从现在到 2020 年，事实上今年 GDP 的数字上，只要达到每年大概增长 6.3%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事实上有相当的连续性，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因为有了新的政策就把原来的定量的目标放弃了。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应该是 6-6.5 之间。但是整体是有一个转变，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陈启宗：懿宸，你这个问题我不大同意，要是今年是 6.8%、6.9%，明年是 6-6.5，总体是慢下来。但是刚才赵先生说消费非常好，出口也非常好，唯一公共投资这块的增长速度慢了一点而已，你认为整体经济会慢下来吗？

张懿宸：我认为几点，一是今天出口对中国经济拉动没有那么重要。随着周边环境、世界经济形势复苏，美国、欧洲、日本都好一些，对中国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对 GDP 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第二，消费这几年的增长事实上速度是非常快的，能不能保持这个势头，是不是还会再加速，我个人是存疑的，我看到三四线城市，因为我兼麦当劳中国的董事长，所以我看到这个趋势，但是这几年消费中间也有一些相对不太理性的，因为消费金融等等带动，今年国家在控制金融风险，尤其对现金贷等等一系列的，会不会对消费造成影响，我不敢说。最重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移动公司的设施，这方面的放缓，公共设施和房地产是两个最大的投资方面的。房地产在中央整体控制，房地产一线城市限价，二线城市从某种意义上也开始限，这种状况下能不能像

2017 年那样火爆？我个人也存疑。公共设施已经非常明确的释放出来好几个讯号，比如说包头的地铁，已经上马的被强行停掉了，这些都是非常强的讯号。不要以为公共设施投资是不会错的，提前量太大也是一种浪费。基于这些，我认为应该在 6-6.5 之间，不是 6.5 以上。

陈启宗：包头这些项目为什么强迫性的停下来，是不是因为整体借贷太厉害，所以政府就要压借贷，不让这些公共设施的项目进行？

张懿宸：确实，包头本身负债非常高，而且对财政收入一年才大概几百亿的城市来讲，最多好像一千亿，这个数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整个投资地铁大概就要两百亿到三百亿，这对一个这么高负债的城市来讲是承担不起的。

陈启宗：南鹏，你认为今年的经济会比去年增长得慢？世界形势不错，中国内地也不错，会不会真的慢下来，像张懿宸说的那样？

沈南鹏：我和他估计差不多，从消费升级来说，大的趋势没有改变，但是在发展当中还是会有不同的节奏，金融方面去杠杆可能会影响消费的成长。过去十几年经济的发展是得益于非常优质的、良好的政府所主导的基础建设。再讲回电商的例子，中国电商为什么渗透率如此高？因为路和高速公路已经是非常好的基础建设，大家可能忘记了，中国政府推动电子商务中最重要的无形之手，“三通一达”这样的公司能起来，能把包裹这么短时间递送到每个用户的手上，假如以后的基础建设更加理性，这方面恐怕会拖延一部分所谓消费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但是长期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

陈启宗：我作为购物中心的投资者，以往这一年消费增长真的很厉害。

方风雷：去年增长很快主要是下半年，下半年的消费增长主要得力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公共消费支出增长，这是中央财政拉动的。中央财政会不会在今年或者未来几年持续把这个科目做大，我认为不一定。公共消费的消费会不会保持这种增长速度，难说。但是总体消费会持续增长，也有人说今年一个最大的经济上的核爆炸就是中国今年的消费增长超过美国，就是总体消费超过美国，但我觉得跟美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去掉中央财政拉动的公共消费，能不能持续保持增长速度，还得看看财政的具体政策。

陈启宗：老方，我和你打赌，我认为民间消费应该还是非常不错。赵先生，我想你们的数据也应该表示这个吧？

赵柏基：是，我先说说。第一点，方总、沈总他们刚才说的数字是不重要的，我有点担心，作为专业的会计师，数字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同意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不能仅仅看一两年的事，是一个十年计划、五年的计划，是长远的发展，所以那个是重要的。第二个是看质量，数字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我对于 2018 年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分享一些数字，2017 年 APEC CEO 调研报告里面，我们发现中国国内

CEO 对未来一年，当时是 2017 年，现在说是 2018 年，对 2018 年经济发展信心非常高，比 2017 年高了一倍。还有几个数字是我觉得很重，81% 的国内的 CEO 在未来一年，就是 2018 年他们非常有信心推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然后 57% 的 CEO 会在国内的市场推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这些新的产品会推动更多的消费的增长。

陈启宗：方总，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没有了？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因为我们在争到底是 6-6.5 还是 6.5-7，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基于这个问题可以带出很多对今天实体经济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2018 年中国主要的增长动力在于哪里？1、积极的财政政策；2、出口复苏；3、经济开放与体制改革；4、“一带一路”；5、创业；6 创新。

还是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重要，但不是太重要，出口的复苏，大家不认为那么大的意见是，反而经济开放和体制改革占最大的比例，第二个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其他的大家明白。又回到在座各位，张懿宸，你认为这一年的增长动力主要在哪儿？

张懿宸：我投的是 3。

陈启宗：具体说一下，怎么的体制改革法？

张懿宸：因为整个经济要高质量的发展，最关键的是要突破整体经济的相对比较低效，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效率比较低，一方面是要靠经济开放，进一步开放，允许外资、民营企业参与到各个领域中间来。第二方面是国企改革，包括整个改革中，从量上来讲，因为中国现在是 80 万亿人民币这样大的经济体，在这样的经济体中间，事实上无论是包括投资，还是“一带一路”，当然“一带一路”长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其实你把这些东西从量来讲，对 80 万亿经济体的影响始终是有限。在这中间，你要看，最具体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是我们已经形成了大概 150 万亿的资产，如果它的效率提高 1%，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这点来讲，其他的都很重要，真正要让整个经济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在效率上有非常大的提高，国有体制、国有企业改革，整体体制上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沈南鹏：我认为里面每个都很重要，如果说最重要，我认为是 3 和 5，为什么呢？我感觉我们也不要眼光光看 2018 年，今年是改革开放的 40 周年，过去的 40 年、20 年，什么样的因素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我感觉这两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在经济的开放政策，一个持续的政策。过去 20 年中，财政政策可能会有

一定的浮动，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经济的开放。在这上面，光有这样的政策，如果没有人为的因素努力创造这些优秀的企业，那中国也不会走到今天。如果要去描述过去 40 年的成长，底层的原因，也是 2018 年以及以后的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我感觉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确实，不管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到现在第二代、第三代的创业者，这种精神、这种愿意敢为天下先，敢于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敢于新的产品和服务，这种精神我感觉适应了这个体制的要求。这两个结合使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今天。这种创业家精神不仅在私营企业，也包括在国有企业的改革。

陈启宗：国有企业的改革像什么呢？

沈南鹏：国企也有在行业里面做得非常好的，甚至在市场经济非常激烈的消费行业里面，国企也有做得非常好的，他们管理层也是同样具有创业家精神，给自己设置更高的目标，有改变未来在行业当中做出领先地位的雄心。

方风雷：财政政策都是反复应用过的，出口也是三头马车之一，但是我觉得进口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面比出口更大，过去几年中国的进口增速一直比出口增速高。但用最准确的语言说，还是习主席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准确说就是把供应链搞活，供应链搞活就把企业搞活。供应链搞好最重要要做几件事，首先是行政审批，现在还是太多。第二是乱收费太严重，特别是容易滋生寻租、灰色收入，这把中国企业的积极性、制造业的优势给抹平了。第三是社保负担太重，中国社保差不多 50%、55%，新加坡只有 36%，所以社保负担太重，而且多头管理，五六个部门。第四是税收改革，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中国现在个人所得税是专业人员税，因为老板也不交这个税，专业人员税收得太高对于中国发展高端产业非常不利。所以这是真正把供应链搞活最重要的措施。所以这是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陈启宗：你刚才说的那四点改革，当然还有其他的，你认为今年会有进步吗？有进展吗？

方风雷：内部不这样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积极性都没有，必须这么做。第二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比较，特别是美国推出了税收政策以后，所以必须改，不改过不去。

陈启宗：所以你认为今年是改革进步的一年。

方风雷：但是会聚焦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供应链搞活，这是重点。

赵柏基：我投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良好的政策，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刚才方总也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九大报告里面已经说了要加强，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我们看几方面的行动计划，比如“互联网+”，这就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有效地融合。中国制造 2025，这个主要是解决中

国现在制造业发展未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大而不强的难题。这个会推动大量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为什么重要呢？“一带一路”倡议会带来很多不同的机遇，所以这些都是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

陈启宗：前几年我们都有另外一个问题，今年没有放在上面，就是今年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外在的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或者美国压制中国出口等等，或者说世界经济上有一些动荡，这是外在的原因。内在的，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社会稳定，所以你们认为这一年对中国经济威胁最大的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张懿宸：我认为最大的危机还是外在的，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问题都有基础，现在国家领导层掌控能力非常强，在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国际整体的变化，尤其美国从自己建立国际秩序中抽身而退，而且到处挑动各种各样的矛盾，整体的世界局面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美国机制系统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总统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国内我个人最担心的，近两年来一直是金融系统的风险，但是我觉得在这点上很明显，中央领导层对这点的判断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为什么2018年“三大攻坚战”第一个就是化解金融风险，既然能把它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应该说最后不会成为最大的风险。刚才讲到GDP的增长，有一个潜在的是帮助GDP最后增长超过我自己预测的，我自己认为今年很可能出现的是通货膨胀，全世界的成本结构都在提升，中国对环保成本，对一系列的成本，在政府的监管加大力度的情况下，我认为通胀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是从人工、环境等一系列，一旦通胀起来，我认为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再上几个台阶。

沈南鹏：我跟懿宸的观点比较相近，我补充一点，从国内来讲金融去杠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应该一下子完成，那会造成体系里面很多风险在一个阶段里释放太多。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管理，这个过程中可能在某些行业里面可能会有短时间的阵痛，但是长期看这肯定是一个更加健康的生长，以前的增长确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杠杆拉动太大造成超前的投资，或者非理性的投资，这需要回归到良性增长当中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陈启宗：风雷，你看事情往往与众不同，往往是从比较消极方面来看，你今年担心什么？

方风雷：通常讲四个问题，一个是货币超发怎么消化，过去15%、16%、17%，现在降到个位数。第二个是国企改革，第三个是过剩产能，第四个是地方政府，这四个当中大家通常比较关心金融机构，关心地方政府债务。金融机构也不是产品问题，也不是资产管理的巴塞尔III之外的非标准产品，金融主要是监管问题，监管问题解决了就没大问题。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四个问题都是风险暴露很充分的，所以也不构成重大问题。我倒是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我们在如何管理一个开放的，而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管理社会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国家能力的建设问题，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恐怕今后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关注这个问题。

陈启宗：我这样解释对不对，外面的环境一直在变，而且变得非常快，政府的管

制也就要跟着外面的环境改变而改变，能否跟得上变的速度？这样解读有没有错？

方风雷：现在利益多元化，又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过去管理的方法不行，所以很多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可能是非经济因素，所以我觉得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陈启宗：这些东西是大家都没见过的，国外没见过，国内也没有见过那么快的改变速度，那很可怕的。

方风雷：是啊，所以这是大问题。

陈启宗：那你担心吗？

方风雷：我不担心。这是个问题，比别的问题我觉得更突出，但是中央政府能管控得了。

陈启宗：外在的东西你担心吗？

方风雷：不担心，没大事。

陈启宗：美国的新总统，英国脱欧等等对你来说不是大问题？

方风雷：中美肯定会有摩擦，但是不会有全面的接近于这个战那个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不会出现，有摩擦可能一段时间很激烈，但是下半年就会好转，明年可能更好一点，这是中美之间的规律，不会有全面的事情，欧洲更不会了。所以总体来讲，中国还处于一个比较能够应付的国际环境。

陈启宗：我对你的尊敬又加一分，因为你非常同意我的看法，Raymund。

赵柏基：我觉得刚刚已经说了很多了，我补充两方面，怎么控制金融风险非常重要，刚才几位说得很清楚了。还有两方面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也是受到外面的影响的。所以刚刚也提到了，外面的政治环境也会对我们有影响。

陈启宗：好的。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未来一年，哪个行业在中国有最大的增长潜力？有7点，我们现在开始选择。

医疗 22%，科技、电讯和媒体 34%，大家对房地产非常没兴趣，非常好，少了竞争对手，因为我是搞房地产的。律师行业大家也看得不错，金融服务，大家对金融服务不是太有兴趣。

柏基，你是搞会计的，你们什么公司都要对付，你怎么看？

赵柏基：我觉得里面所有的行业，我同意的是地产比较低，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对手。其他是重要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会投第二和第七，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新的经济都是和科技创新有关系，刚才有说“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商业等等都是新经济的发展推动未来经济的重点，我觉得那些都是很重要。我分享一些很简单的数据。

2017年的APEC的调研报告里面，我看见未来3年国内的CEO，83%的CEO说，他们未来3年重点也是把企业自动化。你看商贸或者科技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还是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所有的行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中等收入人口，未来10-15年，这个数字会增加3-4亿，那么巨大的人口充分的说明了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所以你不仅仅看单一行业，有巨大的中等收入的人口对每方面都有需求，所以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是重要的在未来的发展。

方风雷：服务型服务业，包括体育、文化、教育、卫生、这种服务型服务业增长比较快。第二个是生产型服务业，物流、高端要素市场的建立。第三个，除了生活便利化，现在支付，最主要的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东西能够用于提升传统行业。另外就是高端消费品，特别是和食品、农产品有关的这些，这些应该增长比较快。

沈南鹏：其实我很惊讶，上面没有消费，因为消费和当中几个行业有重叠，消费互联网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电子商务。还有医疗、教育、旅游等等，这些所谓消费升级当中很明显能够带来很大增长的行业，我感觉这是增长非常有潜力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关注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最近刚刚做了总结，从红杉来讲，2017年和2016年比，我们关注的四个领域里面，投资规模最大的是工业技术。以前大家可能感觉中国是制造业体量很大，但是技术比较落后，过去的10年、20年，这个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在很多高速发展的行业当中，因为市场在中国，所以靠近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今天我们看到深圳和广州地区，大量的消费电子生产在那边，终端生产在那边，配件也会相应的跟上去。像手机、电动汽车，我感觉中国的企业是有机会，因为贴近中国市场，对传统的上下游能够有改造，能够在这个竞争当中胜出，最后自己的产品变成全球的产品。像今天看到手机厂商当中，中国的公司在全球排到前十名中的40%。未来电动汽车行业，中国的企业也有可能这种赶超的能力。

张懿宸：我投的是4，主要的原因是我和南鹏一样，没有看到有消费。我投4，在这当中选一下，在一年以后可以看一眼，和其他所有行业相比，你注意到中国的环保行业有一个特点，中国的环保行业，如果你想找一个比较象样的投资标的公司，你是找不到的。但是政府这么多年，尤其最近这一两年在环保监管的要求压力加得特别大。但是以往这个行业的企业很多要靠政府补贴，所以活得不太好，因为找不到象样的公司。选这个，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个行业从供应商是不足的，是可能今后一年有非常大的投资潜力的。像刚才沈南鹏说的，我觉得应该选消费。

陈启宗：民间消费、老百姓的消费，不是公共的消费。

张懿宸：以麦当劳为例。

陈启宗：他刚刚花了 20 亿美元左右买了中国的麦当劳。

张懿宸：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去年 1 月份签约，后来开始接手整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到今天到我们接手的时候大概 2400 家店，到现在开到 2600 家店，平均每天开一家新店。但是即使这样开，速度是远远不足的，到处都有人来找，比如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地级市很多都找不到麦当劳。而且整体在麦当劳消费的理念和在美国、香港或者中国的一线城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国、香港和中国的一线城市，麦当劳在大家看来是价格最低，同时又是食品质量有保障的选项。但是到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到今天可能是你去哪儿约会，全家到周末一家老少到那儿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围绕这个，刚才沈南鹏讲了互联网和消费的结合，美国人就觉得最普通的麦当劳的消费方式就是开车到麦当劳去，但在中国，开车过去从来是不行的，因为中国人口密度高很多。相反，中国用数字营销，中国用外卖，实际上让美国人瞠目结舌，他们想不到，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支持，2017 年外卖增长 81%，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外卖已经占整个销售额的 25%，而且还在增长。如果你坐在美国，你根本想不到。数字营销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合作，我们和微信用小程序，仅仅 6 个星期就可以做出来一个激增计划，送电子礼券，在美国我们和麦当劳总部商量，他说做这个东西要一年半。中国的整个速度让麦当劳总部不可置信。11 月份我和麦当劳全球管理层坐在一起谈这个事情，讲中国的变化，他们说，中国在这方面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全世界都应该向中国学，你们赶快告诉我们你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东西像沈南鹏说的，有相当部分是因为中国的政府对网上支付、对电子支付，对一系列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造成了这样环境，让麦当劳能蓬勃发展，最简单的事情，中国人肯定都知道，2017 年互联网上最轰动的，一个营销，但是完全本意根本不是营销的，就是麦当劳改名金拱门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自己没有想到，我原来想用别的名字，麦当劳不让我用，我一气之下就叫金拱门，最后有关这个的新闻在网上的阅读量是 90 亿次，平均每个中国人看到 6 篇有关改名字的各种各样文章，这种营销力度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找到吗？这就说明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

陈启宗：沈南鹏，你刚才说红杉有四个领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很有兴趣，跟风，跟着你走，你做得好。

沈南鹏：医疗健康、科技、媒体和电讯、消费、工业技术。

陈启宗：你刚才提到工业 4.0 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再展开多说一点点，到底现在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业，好像还是很多的误解，你可不可以具体再多说一点？

沈南鹏：首先最有机会的是在这个产品本身的替代会比较快，讲回手机的例子，首先在终端的手机上，因为中国的市场比较大，所以中国有四家领先的公司，当然还有一批小公司，这四家以后依附中国市场，他们可以占据全球市场份额。因为这些公司在中国，当然包括苹果、三星，所以它的迭代要求也很高。所以今天零配件的生产全部在中国，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的广东一带，在深圳和广州。因为中国本身的技术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的技术是跟得上的，同时我们的成本也是有一定优势的，OEM生产也在中国，这样造成所有的配件都是在中国产生的。这在全世界的产业链条里面中国公司的机会，当然技术还需要不断创新。

这个相比基础行业就不一样，很多应用替代速度没有那么快，这可能会造成100年历史的一家欧洲公司或日本公司会有一定的优势，他还没有被中国公司替代。但是当产品不断替代的时候，中国公司的机会就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就来了。

陈启宗：我提醒大家有三家公司不可思议的，三家都是中国公司，全球60%-70%的汽车玻璃都是他一家公司的，曹德旺先生，不只在中国制造，现在在全球制造。第二，手机，你刚才说世界十大品牌当中有四个在中国，小米、华为、vivo和oppo，全球70%-80%的手机玻璃是在中国两家公司制造的，其中一家创办人在香港，当然工厂是在内地，第二大那一家是从他那里偷的技术出来的，我听说，基本上两家公司占了全球70%-80%的份额。另外一个，我希望明年能够把他请到这来讲，全球电动汽车的电池，全球30%左右是一家中国公司，除了特斯拉之外，所有的牌子，不管是奔驰、丰田全部都向他购买电动汽车的电池，一家公司，在上海的。我讲这个是印证南鹏讲的工业4.0的趋势，当然还有很多非常落后的制造业，但是有很多是已经非常高科技，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赵柏基：我非常同意刚才讲的，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技术还是低技术，或者是抄袭的，这肯定是错误的。在中国现在有很多行业，在行业领域里面，不同的行业领域里面已经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刚才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无论是手机的，或者是移动支付，或者是共享经济，综合服务平台等一大堆都是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陈启宗：现在我这里很多问题，我就选一些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有人问“一带一路”，早上我们也听了不少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一带一路”对企业来说，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真的有机遇吗？要是有的话是什么机遇？或者说国内市场对你们来说太巨大了，你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一带一路”的事，还是你们认为有机会呢？

沈南鹏：“一带一路”包括到那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另外一个是从互联网来讲，中国公司从过去几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叫出海，中国商业模式，

尤其是中国比较独特的商业模式在海外得到运用，尤其我们今天看到在中东、东南亚，很多中国的互联网产品已经在当地变成了最重要的应用。我们在去年年底刚刚投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总部在中国，但他是中东最大的电商公司，超过了亚马逊在当地的规模。中国有大量的供应链的优势。中国电商的运营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从阿里巴巴和京东两家公司有相当多的人才是做电商运营的。在虚拟世界里面，中国在“一带一路”上也有很多产品和服务输出。

张懿宸：我们内部是有“一带一路”基金的，我个人觉得“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战略性的倡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讲需要依托于整体的生态系统和环境，而且切忌把“一带一路”完全当成一个中国的倡议，这是中国提出来的，但是对全世界都是好事情。中国政府已经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的。包括我也在香港贸发局的“一带一路”委员会上，应该发挥香港本身的作用，应该把“一带一路”很多项目的融资不要做成双边的，中国的企业去做，中国的银行贷款等等，变成两国的政治外交问题了，而应该变成经济问题，利用香港的融资平台把融资渠道拓宽，资金来源多元化，参与方也多元化，可能资金的主体刚开始主要是中国，但因为有很多其他国家参与，因为可以用香港的法律框架等，任何时候出现了问题更多变成了经济问题，而不是上升到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问题。

赵柏基：我觉得“一带一路”的机遇是很多的，只是很多人我觉得还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只是“一带一路”带给我们或者所有人的机遇。比如我们对五条线路，六条经济合作走廊，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很多人都觉得“一带一路”只是一个基础建设，除了基础建设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发展，会带来很多不同方面的机会，比如说电信、物流、零售、医疗等等，都会有很多的机会。

方风雷：我想说“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有一个背景，中国的经济规模到了一定的阶段。中国在国际关系上，要积极有所作为，选择“一带一路”的提出是非常正确的。第二，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第三，现在应该是有重点，要讲究经济效益，同时注意产业布局。和国内情况一样，国内有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一带一路”最终还是要看中国和沿线国家，中国的国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和国际社会的融合，和互相了解，才能最后成功。

陈启宗：我这样解释“一带一路”看在座各位是否同意，对我来说“一带一路”好像没有分别，“一带”是陆路，国家都是很大，都是比较落后，基本设施非常不完善，可能制度比较落后、比较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基础设施是最重要，这就需要很大的资金，也需要有国家的力量。“一路”，这个路是海路，人类经济发展总之离不开水，无论是河还是海，所以人类总是聚居在水附近的地方。“一路”，人口众多，国家比较小，而且比较发达，那些地方都是大市场。比如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等，东盟各国，还有孟加拉、巴基斯坦等等，都是人口非常大的地方，印度更不用说。好像“一带”、“一路”在观念上有点不同的地方。我们看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方面的认识，在陆路和海路投资有点不一样，说不定，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赵柏基：我非常同意，我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数据，我们刚刚做完了全球 CEO 的

调研，发现 58%的中国企业的 CEO 说，他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现投资机遇，所以他们发现有很多机会。

陈启宗：还有别的吗？没有的话，我们转到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问大湾区，早上也有人提到，大湾区 11 个城市，大概 6600 万人，人数比南韩还要多，经济体差不多等于一个韩国。这个大湾区有机遇吗，值得我们投资吗？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在这个大湾区里面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各位分享一下。

沈南鹏：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做了一个孵化平台和投资平台，有两个非常正面的发现，一是香港还是有很多优秀的科技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围绕六大高校。当然我相信香港还有很多别的创新，至少六大高校里面还有很多科技化的产品，这个工作以前做得比较少。我们也是在当中作为一份子在推动，这个结果是超过我们预想的。

二是香港很多产业优势可以跟大湾区别的城市的产业优势联合起来，在科技最领先行业里面，比如智能硬件在微电子里面，香港有很强的人才、有很强的研发能力，最后的生产和制造和供应链在深圳和广州，大湾区的协同在这些行业里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我感觉重要的是香港的创业者、企业家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融合在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当中，整个布局当中。但这确实是巨大的产业迭加的机会。

张懿宸：我觉得作为整体大湾区的城市群，无论是这中间许多城市在自身的竞争能力上，在全世界，出现这样的城市群，有这么强的方方面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互补的，这是很难得的。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历史性升级的机遇。而且在这个机遇中间，这中间我和南鹏都是在香港住了 20 多年，我们自己虽然往国内跑得比较多，全球跑，我们是把香港当家的。我们真心的认为在这样一个机遇下，如果香港最后再错失机会，自缚手脚，我觉得历史的后果就会很严重。目前起码有一点，香港自身的定位，尤其在金融上的定位，在珠三角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可以取代它的。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任何其他的城市可以取代它，但是随着整体经济量越来越大，如果你同样把香港放在长三角，它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在珠三角中有，但是在很多和整体广东的协作上、合作上，人、才、物三方面的交流上，如果不打破既有的作茧自缚的做法，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陈启宗：赵总，你是不是香港出生的？

赵柏基：我是。

陈启宗：香港有两个本土的。

赵柏基：你和我。

陈启宗：所以你和我的普通话是最差劲的。这里也回答一个问题，香港创新创业，

以往几十年是比较弱的一点，50年代、60年代非常弱，慢慢的就弱下去。以往这5-10年，包括有些在内地创新创业非常成功的人士，像南鹏这样的人跑到香港来，帮助香港推动创新创业的平台，我从来认为香港不是个可以搞高科技的地方，但是现在我开始有改变，因为香港的大学非常不错，特别是医疗方面，还有工程方面，这两个都是很多香港大学的强项。慢慢的年轻人得到南鹏、懿宸这样的人鼓励，慢慢就有非常不错的发展。像刚刚懿宸说的，心态方面不能光看香港，制造工厂一定要放在香港是不可能的。大疆无人飞机为什么在深圳不在香港？香港有那么多地？好的东西不一定要在香港做，香港有自己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尽自己的力，加上大湾区的配合下，应该是非常可为的。懿宸说的算是对香港的警告，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

包括另外一个问题，生物医药方面也是香港非常可以发展的一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停下来。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还是你们认为中国很有把握突破？

方风雷：中等收入陷阱这件事，经济学界都有不同意见，有没有这件事？但是基本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是指当年拉美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问题跟他们民粹主义有关系，如果中国避免了全面性的民粹主义，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我觉得目标很清晰，因为中国是一个有长期规划的国家，短期、中期、长期，中国衔接得很好，这是很多过程不具备的能力。中国目标很清晰，这次提的三步走讲得很清楚，2020年达到联合国、世界银行所定的初级发达国家，就是1.3万美金。第二步，2035年基本上按照数字来算，就是2.5万美元。第三步，2050年所谓进入比较发达国家。这三步其实都和三个数字有关系，1.3万美金、2.5万美元和4万美元。这三个数字不知道怎么做计划，但是1.3万美金，最新的初级发达国家，2.5万美元是略高于今天的台湾，2050年4万美元，就是略低于德国和今天的香港。所以中国的目标很清晰，而且中国不会出现全面的民粹主义，所以中国不会陷入中等什么收入陷阱。

陈启宗：其他各位都同意哈？最后一个问题，未来50年，世界第一产业是什么？最大的产业。

张懿宸：旅游。

陈启宗：南鹏，你搞旅游的，但是你把它卖掉了。感谢你帮我赚钱。你怎么认为？

沈南鹏：世界前十大的市值公司里面七八家都是技术公司，我感觉如果50年以后，应该讲技术一定是大公司后面最重要的驱动力量。

方风雷：我的说法还是服务型服务业。

赵柏基：医疗，人口老化，医疗服务很重要。

陈启宗：最后我总结两三句话，我认为中国是商业机遇最多的地方，6%的增长也好，6.5%也好，7%也好，这样的增长除了印度之外，难得有一个大的经济体。中国还是最好投资的地方，而且可预见性非常高，而且是相对稳定的地方，只要中国在社会政治层面不出问题，中国应该是相对来说最稳定的地方。同意吗？

方风雷：同意。

陈启宗：最后是要到中国内地投资，最好先到香港来，香港有很多人才，中国内地的三位人才当中有两位到了香港住了 20 多年。方总，你什么时候要到香港买房子，打个电话给我，立刻给你搞一套房子。

方风雷：买恒隆的房子最好。

陈启宗：谢谢四位讲者。